

十七世纪的咖啡馆 藏着一部欧洲社交史

上社交网站恐怕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网上活动;调查显示,全球每5个互联网用户中就有4个——或者说大约14亿人,在使用各种社交网站通报自己的最新情况。他们中的一些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刷屏”,或分享照片,或推送链接,或发表评论。

当我们在探讨社交网站的兴起究竟是利是弊时,孰不知在17世纪,咖啡馆作为当时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应。汤姆·斯丹迪奇在《社交媒体简史:从草稿纸到互联网》一书中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段历史——17世纪70年代,咖啡馆在欧洲兴起,各行各业的人在此流连忘返,咖啡馆因此被痛斥为“辛勤努力的大敌”。但同样是在咖啡馆,人和思想的交汇融合带来了科学、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创新。咖啡馆提供了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思想不期而遇的环境,因此成为集体创新的温床。

17世纪中叶,咖啡馆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项发明,改变了西欧分享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它提供了一个新环境,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在愉快的气氛中阅读并讨论各种不同的问题。

对这种新的社交场所,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有些人担心,在那种具有强烈吸引力、信息丰富的环境里,各种琐碎的信息、流言蜚语和虚假不实之词源源不断,令人听之成癖,使人无法集中精力做更有效益的事。然而,另外一些人衷心赞成这个人人平等的新的知识空间,并认为它“有益健康,培养节制,所费不多,教人礼貌,还激励聪明才智”。

这里是纯粹交换信息的场所
社会地位差别被抛在一边

咖啡于15世纪末开始在阿拉伯世界流行,公元1600年左右流入欧洲,那是欧洲首次接触含咖啡因的饮料。它先是得到欧洲的植物学家和医生的青睐,但由于它能提神醒脑,很快为整个社会所欢迎。与咖啡豆同时而来的还有咖啡馆的习俗,咖啡馆在阿拉伯世界是重要的聚会场所和消息来源地。1609年,一位英国旅行者威廉·比杜尔夫注意到:“他们的咖啡馆比英国的啤酒馆还多……有什么新闻都在那里谈论。”

欧洲的第一批咖啡馆于17世纪40年代在威尼斯开业,英国是50年代,荷兰是60年代。在欧洲,特别是清教徒的英格兰,咖啡馆很受欢迎,被认为比小酒馆更体面。咖啡馆不供应麻醉头脑的酒精,而是出售使头脑清醒的咖啡。小酒馆通常光线暗淡,里面有时还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咖啡馆却灯光明亮,陈设着书架、镜子、镀金框的油画和高品质的桌椅。喝咖啡被认为是有品位,乐于接受新思想。咖啡迅速成为科学家、知识分子、商人以及职员钟爱的饮品。咖啡馆也成了信息交流的中心,在那里可以读到并讨论最新出版的小册子、单张新闻纸、公报和新闻信札。

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伦敦接受咖啡馆最快也最热情。伦敦的第一家咖啡馆由帕斯夸·罗塞在1652年开办,他是亚美尼亚人,曾给一位英国商人做过仆

人,在中东旅行期间喜欢上了咖啡。他的咖啡馆一炮而红,引得当地的酒店主人向市长大人提出抗议,说罗塞无权和他们抢生意,因为他不是伦敦的自由民。最终,罗塞被迫离开英国,但咖啡馆这个主意扎下了根。到17世纪末,光是伦敦就有约550家咖啡馆。法国的情况也一样。大城市的不同咖啡馆通常根据所在地的主要活动专门讨论不同的题目。在伦敦,圣詹姆斯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周边的咖啡馆是政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咖啡馆的顾客则以教士和神学家为主,文学界人士在科文特加登的威尔咖啡馆聚集,皇家交易所周围的咖啡馆则挤满了生意人。

无论涉及什么题目,在咖啡馆主要做的事都是分享和讨论新闻和各种观点,有口头表达的,有手写的,也有印刷品;咖啡馆的顾客除了喝咖啡、吸烟,还想了解吸收信息。客人一踏入咖啡馆,就会有人透过浓厚的烟雾招呼道:“有什么消息吗?”然后客人就走到一张堆满各种纸张的大桌子旁寻找空位坐下。据1682年一位作者的介绍,进到咖啡馆里面,会看到“一张巨大的桌子,放满了烟斗和小册子”。咖啡馆订有期刊并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有的咖啡馆还有外国日报和公报,或订有手抄的新闻信札。

客人在桌旁坐下后,付一便士买一浅杯咖啡,那种杯子也叫碟子;接下来就阅读或者和别的顾客讨论最新的消息和小册子,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咖啡馆的气氛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交谈,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至少在理论上,这里是纯粹交换信息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畅所欲言,对各种思想反复斟酌,根据其是否合乎道理或被人接受吸收,或予以摒弃。

咖啡馆如此大受欢迎,查理二世甚至担心它们会成为阴谋造反的中心,1675年曾企图予以取缔。一份皇家宣言宣布,咖啡馆造成了“至为邪恶危险的结果……因为在咖啡馆中……编造并传播各种恶毒的污蔑不实之词,中伤陛下的政府,扰乱王国的和平安宁”。宣言一发表,舆论立即大哗,因为此时咖啡馆已经成了伦敦商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角色。咖啡店主由托马斯·加拉韦领头,组织了请愿团进行抗议。财政大臣也站在他们这一边,他提请国王注意,咖啡馆出售咖啡、茶和巧克力,给政府带来巨额的税



《社交媒体简史:从草稿纸到互联网》
【英】汤姆·斯丹迪奇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收。国王的一些顾问也对这一禁令是否合法提出了疑问。于是国王很快收回了成命。1675年12月29日发表的宣言到1676年1月8日就撤回了。

是虚度光阴的“学术杀手”
还是探讨科学的“便士大学”

咖啡馆这个新环境太诱人了,永远不知道下次去时会听到什么消息,或遇到什么人,常客经常在里面花上好几个小时阅读讨论,丝毫不觉时光的流逝。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咖啡馆,咖啡馆使有些人忧心忡忡。他们不满基督徒居然弃传统的英国啤酒去喝穆斯林的饮料,担心酒店主人的生计难以为继。但他们抱怨最多的是咖啡馆使人分心,本应做正事,却把时间浪费在和朋友谈论无聊的小事上,这和今天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如出一辙。

咖啡在牛津大学开始流行后,咖啡馆越开越多,于是大学当局提出了反对,担心会造成学生的懒惰,影响他们学习。牛津大学的一位古文物研究者安东尼·伍德对热衷泡咖啡馆的风气作出了严厉批评。“为什么扎扎实实的学习越来越少,大学里几乎没有有人认真学习了?”他问道。“答案是:因为有咖啡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里了。”



反对咖啡馆的人通过写小册子发表批评,这是可以想见的。1673年发表的《解释英国的一大关注》的作者抱怨说,咖啡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害,毁了国王的众多子民;它们是勤劳苦干的大敌,断送了许多认真向上的年轻绅士和商人。他们在去这些地方之前是勤劳的学生或店主,知道如何管理时间和金钱;但自从咖啡馆出现后,他们以节约为借口,为了避免一次花多于一便士或两便士的钱,去咖啡馆和朋友聊天,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刚刚写完又进来一个熟人,又开始新的话题,所以他们经常在咖啡馆泡五六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的学业或生意都被抛在脑后)。”

与这种意见形成对比的是,像《旁观者》的创刊人约瑟夫·艾迪生这样的支持咖啡馆的人认为,年轻人去咖啡馆可以自我提高,了解世界,并学习得体的举止和高雅的品位。《旁观者》和比它先创刊的《闲谈者》一样,既对咖啡馆中的讨论发表评论,也鼓励激发这样的讨论。为了给伦敦以外的读者提供全面的概要,《旁观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咖啡馆,艾迪生在里面努力向读者灌输“明智健康的情感”。

“人说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艾迪生在《旁观者》1711年3月12日刊中写道,“我不揣浅陋,希望人说是我把哲学带出了密室、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使其在俱乐部和集会中,在茶桌旁,在咖啡馆里扎下根来。”

在一本题为“为咖啡馆辩护”的小册子里,作者在赞扬咖啡馆能改善性格的时候提到:“简言之,无可否认,这里的人是最礼貌,总的来说也是最聪明的一群;经常聆听他们的交流,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必定能改善我们的礼仪,扩大我们的知识,使我们的谈吐更文雅,行为更安详,应对更得体。”

咖啡馆到底能否改善人的举止姑且不论,人们愿意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咖啡馆不仅无碍于知识活动,反而积极促进这类活动。

它们有时被称为“便士大学”,因为任何人只要花上买一碟咖啡的钱,就能旁听或参加交谈。当时的一首歌谣说得极好:“这么好的大学,从未有过;花一便士,就能当学者。”对当时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的进步感兴趣的人特别喜欢在咖啡馆里讨论这些高深的问题。胡克的日记显示,他和他的科学家同行在咖啡馆里进行学术讨论,同制造实验仪器的技工谈判,有时还在咖啡馆里做科学实验。

《原理》在咖啡馆起源
《国富论》在咖啡馆诞生

胡克和几位科学家同事,包括克里斯托弗·雷恩和罗伯特·玻意耳,17世纪50年代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喜欢上了咖啡。到伦敦后,他们继续保持了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习惯,他们的团体和几个其他团体在17世纪60年代共同组成了英国最早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学会的成员还包括佩皮斯、艾萨克·牛顿和爱德蒙·哈雷。大家经常开会后一起去咖啡馆继续讨论。

正是在咖啡馆里的一场争论催生了科学革命最伟大的著作。1684年1月的一个晚上,胡克、哈雷和雷恩在咖啡馆里闲聊时谈到了万有引力的理论。哈雷一边啜饮咖啡,一边自言自语,说不知行星轨道的椭圆形是否由万有引力导致,而万有引力的力量则以距离的平方反比递减。胡克说确实如此,只用平方反比律即可解释行星的运动,他说他已经为此推理出了数学的证明。但雷恩也曾试图找出这方面的数学证明,却没能成功。

几个月后,哈雷造访了住在剑桥的牛顿。哈雷向牛顿转述了他那次在咖啡馆与雷恩和胡克的谈话,并向牛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律是否会造成椭圆形的行星轨道?牛顿和胡克一样,说他已经推证了这一点。虽然当时哈雷要看证据时他拿不出来,但他

经过埋头研究后,很快把证据送给了哈雷。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只是前奏而已。哈雷提出的问题推了牛顿一把,促使他把多年的研究成果正式组织起来,写出了科学史上第一部最伟大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通称《原理》。在这本1687年出版的不朽巨著中,牛顿展示了他的万有引力原则可以解释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运动,从坠落的苹果到行星的轨道。

胡克坚持说,是他在几年前和牛顿的通信中提出了平方反比律的想法的,牛顿是受了他的启发。但是,1686年6月《原理》第一卷提交皇家学会后,胡克在咖啡馆的又一次讨论中没能说服其他的科学家。在咖啡馆那种任想象翱翔的环境中提出一个想法和证明该想法的正确无误,两者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胡克和牛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发表或正式向皇家学会提出过他的想法,可他又总是说别人的想法是他先想到的。咖啡馆作出了裁决,裁决的结果延续至今。

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牛顿的《原理》起源于咖啡馆,同样,经济学中具有同等意义的著作——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在咖啡馆中诞生的。《国富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斯密在大英咖啡馆里写成的,这家咖啡馆是在伦敦的基地和通信地址,来自苏格兰的学者都喜欢在这里聚会,斯密就是在这里把写好的各个章节分发给他们阅读,听取批评意见的。

无疑,如同批评咖啡馆的人所指责的,泡咖啡馆确实有浪费时间之虞。但咖啡馆也提供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知识和社会环境。人们在这里聚会,思想的碰撞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发明创造。总的来说,咖啡馆的出现久远大于弊,因此,那些担忧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可能浪费时间的年轻人不要忙着下结论。推特、脸书、领英等互联网平台酝酿着哪些新颖的思想和意外的联系呢?

(摘编整理自《社交媒体简史:从草稿纸到互联网》)



17世纪中叶,咖啡成为欧洲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商人钟爱的饮品。咖啡馆也成为信息交流中心,人们在此畅所欲言,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完全被抛在一边

茶馆是人们消闲、打盹儿、掏耳修脚、斗雀买猫、打牌算命的自由天地;是评书、扬琴、清音、杂耍的戏曲舞台;是说买卖的交易场所;也是讲道理的民间公堂

图为丰子恺作品《茶店一角》



延伸阅读

茶馆里,也有中国的风土和世相

陆纾文

“咖啡还是茶?”

这个耳熟能详的“标准选项”,似乎宣告着咖啡和茶在饮品界平起平坐的特殊地位。然而在今天的大城市,咖啡馆越来越多,茶馆越来越少。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探讨咖啡馆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的著作,讲述茶馆的却为数寥寥。

事实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馆的历史源远流长。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认为,从物质的公共领域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茶馆究竟起源于何时,并无确考。唐贞元年间的《封氏闻见记》里说道:“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一般认为,西晋时期有挑茶担沿街叫卖的,但真正意义上的茶馆出现在唐代,当时叫茗铺。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开元年间,山东、河北至西安等地都“多开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而在所有城市里,茶馆最兴盛的当属成都。早在明清时期,成都的茶馆就已遍及城乡——茶馆是人们消闲、打盹儿、掏耳修脚、斗雀买猫、打牌算命的自由天地;是评书、扬琴、清音、杂耍的戏曲舞台;是说买卖的交易场所;也是讲

道理、赔礼信、断公道的民间公堂。成都茶馆的盛况,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家萧军1938年抵达成都时,就吃惊于茶馆之多,“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在《茶馆——中国的风土与世相》中提到,自己在青羊宫的茶馆里面对上百张茶桌,却“没能找到一个座位”。

有意思的是,和酒吧咖啡馆一样,茶馆也背负着“鼓励人们无所事事、滋生惰性”的名声。

的确,在茶馆里,各色各样的人都能享受休闲时光。以成都为例:茶馆是成都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评书是茶馆里最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娱乐之一。说书人经常在偏僻的街角茶铺中表演,每天讲两个小时跌宕起伏的古典故事,有时要两三个月才能把一个故事讲完。茶馆棋园位于繁华商业区提督街,退休老师和干部常在这里喝茶下棋,切磋棋艺。新华茶园是成都川剧玩友团乐分会的聚会地,锣鼓声和高腔此起彼伏,周围一带清晰可闻。

与此同时,茶馆也是人们交换意见,互通有无的场所。文人尤爱茶馆:1990年代,成都大慈寺庭院里的茶桌每月15日都会汇集一大帮文人组织文学沙龙,作家、收藏家、编辑来此寻茶问道,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来者皆是客。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陈安健的《茶馆

系列油画全以自己浸淫茶馆的乐趣为主题,茶客们是他多年的模特。作家朱晓剑最爱漫游成都的宽窄巷子,去不张扬的小茶馆喝茶,在他看来,“生活和茶一样,本来就是流动的。”何满子也曾戏称自己在其它城市没有勇气光顾茶馆,在成都却无忧无虑地将茶馆当成了办公室。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黎澍在成都做编辑,专门去茶馆写文章。汪曾祺在回忆自己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时戏称“茶馆出人才”,因为“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携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他在《寻常茶话》一文中提到,“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泡”是从北京带过去的字,昆明本地人称为“坐茶馆”,“坐”有消磨时间的意思。联大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聊天、看书、写文章,干什么的都有。在汪曾祺的记忆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喜欢在茶馆里读梵文,另有一位“陆”姓研究生“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品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洗脸刷牙。”

无独有偶,根据历史学教授朱维铮的记述,复旦大南迁重庆时,学生们因为宿舍条件简陋,也都喜欢去茶馆完成作业。

事实上,茶馆与文人之间的联系又何止于一时一地?《儒林外史》里,茶馆成为吴敬梓观察明清社会人情世态的窗口。《茶馆》里,老舍笔下那间小小的裕泰就是大社会的缩影,反映了老北京的各种变迁。藏书家彭雄所著的《茶馆问学记》里,对茶馆里的讨论和记述竟高达211次。

再回到成都的茶馆,不仅为文人们提供灵感,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王笛调查发现,这里也是商讨生意、传递信息的平台——1984年,成都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鹤鸣茶社开了一个交易市场,每周五进行生产资料的交易。城北体育馆茶园的“周五茶会”是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每逢茶会,茶馆内的墙上和房柱子间便挂满了写有各种供求信息的小纸。上世纪80年代“全民经商”的高潮下,“包公司”的老板们更是将茶馆用作进行交易和处理商务的办公地。

打围鼓,唱川戏,说评书,一杯清茶,几碟花生,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国事家事,邻里短长,人情世故,皆是话题。正如王笛所认为的那样,虽然咖啡、啤酒在很多城市日益流行,但咖啡馆和酒吧是无法取代茶馆的,因为“茶馆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包含了更多的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元素”。